



KUNSHAN SHIJI

昆山史纪

王卫平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昆山史纪

王卫平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山史记 / 王卫平主编.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21. 10
ISBN 978-7-5672-3620-2

I. ①昆… II. ①王… III. ①昆山—概况 IV.
①K9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90590 号

书 名: 昆山史记

主 编: 王卫平

责任编辑: 冯 云 杨 柳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34 千

版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3620-2

定 价: 5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481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苏州大学出版社邮箱 sdcbs@suda.edu.cn

前 言

昆山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先辈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里诞生了“天下状元第一家”，唐朝的归氏家族“一门五状元”，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佳话。这里既有顾璘才情妙丽、文采风流的雅集唱和，又有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豪迈抗争。徐氏兄弟“皆以鼎甲致位通显”，文以载道，名噪一时；王韬积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明确提出维新变法思想，推行君主立宪政制，振聋发聩。范成大跻身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反映民生疾苦的田园诗含蕴深广，感情真挚；归氏子孙归有光，古文成就足可与“唐宋八大家”比肩；魏良辅改良昆曲，风靡全国，以至于“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之说，成就了昆山“戏曲之乡”的地位。状元、院士交相辉映，名士、俊彦代不乏人，更有布衣之士朱柏庐撰《治家格言》，成为清代以来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家训经典。现代昆明人，秉持先人勤劳、善思、创新的传统，锐意进取，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取得丰硕成果，创造新的辉煌。

只有了解昆山的昨天，才能理解昆山的今天。

让我们从头说起……



目 录

- 001 第 一 章 始有斯民
- 013 第 二 章 赵陵古国
- 027 第 三 章 鹿城春秋
- 046 第 四 章 市镇林立
- 062 第 五 章 丝路扬帆
- 086 第 六 章 吾土吾风
- 108 第 七 章 玉出昆冈
- 131 第 八 章 玉山雅集
- 154 第 九 章 雅韵渊源
- 189 第 十 章 元音绝续
- 214 第 十 一 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 240 第 十 二 章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264	第十三章	震川文章
281	第十四章	布衣风骨
295	第十五章	丹青巨子
312	第十六章	匠心雅趣
336	第十七章	娄江新潮
353	第十八章	近代先声
376	第十九章	红旗飘飘
403	后	记

第一章 始有斯民

太湖地区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约前 5000—前 4000 年）、崧泽文化（约前 3900—前 3300 年）、良渚文化（约前 3300—前 2200 年）。^①

在生产力低下的全新世早期，人类居住地一般选择在水源附近或丘陵缓坡地带，生活受海平面、湖泊、河流等水体变化影响显著。^② 考古资料表明，目前除 2010 年在江苏省泗洪县海拔 32 米处发现的顺山集遗址外，在苏北和苏南地区均未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研究认为，这是全新世早期高海面造成的。

2013 年，人们在位于昆山市锦溪镇的白莲湖取土时发现牡蛎壳层，牡蛎壳数量丰富，保存完好，单个个体巨大，长达 40 厘米以上。牡蛎壳体在美国 BETA 实验室进行碳-14 测年，年龄为 $(6\ 610 \pm 30)$ 年（校正年龄为 7 230 年）。研究结果表明，牡蛎壳层形成于 7 230 年前，其所含的牡蛎与有孔虫群落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0、486、271 页。

② 朱诚、郑朝贵、吴立等：《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58—463 页。

显示：此时为水动力相对较弱的半咸水潟湖环境。^① 这说明7 000年前太湖平原还不适宜人类生活。

迄今为止，太湖平原还未发现可以用来佐证的距今约6 500年的文化遗址。有关学者通过对江苏省27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统计研究认为：距今4 000—6 000年分布于三角洲平原的遗址的数量和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随着三角洲的发育，长江三角洲平原逐渐成为人类适宜生存的地区，从而扩大了本地区人类居住的范围。^②

昆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2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其中，比较重要又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有绰墩山、赵陵山、少卿山、朱墓村、姜里等。这些遗址的发掘成果，为我们认识昆山史前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那么，昆山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人类活动的呢？早期的人类是怎样生活的，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文化遗存呢？

一、昆山人与稻作起源

距今约6 500年，随着海水逐渐退去，人类从高地下到平地，太湖平原出现人类活动。先民们在平地上开垦出一块块田地，开始种植水稻。

昆山绰墩遗址第五、六次发掘，一共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遗迹64块。这些水田开口在考古发掘所划分的第九层文化层下，打破原生土，呈现为长条形、圆角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的坑（田），而坑与坑之间所保留的原生土为田

① 郭启梅、李保华、王伟铭等：《昆山白莲湖牡蛎层年代及古环境初探》，《微体古生物学报》2014年第2期，第148页。

② 朱诚、郑朝贵、吴立等：《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3-466页。

埂，由几块到几十块田相串联，田块之间有水口连通。另有一些与田块相配套的如水沟、水塘、水井或蓄水坑等，这些均为水田的灌溉系统。^①

绰墩遗址发现的水田，不仅从考古学的角度，诸如形状、结构与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等，证实是人工开挖的史前水稻田遗迹；而且还通过土壤剖面分异、黏粒移动、孢粉学特征、植硅体分布、土壤有机质核磁共振谱和土壤磁化率的变化等理论和技术，对水稻田进行科学界定，其结果显示：遗址史前水稻田的土壤剖面已有耕作层、犁底层、心土层、母质层的分异；史前水稻田孢粉和水稻植硅体与现代水稻的孢粉学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每克（干）土中水稻植硅体均超过 5 000 颗等。^②

绰墩遗址水稻田编号 S27、S46、S42 内经淘洗都发现碳化米粒，特别是在编号 S27 内淘洗出碳化米粒 1 000 多颗，并发现菱角、红蓼等植物及种子。

有关学者对遗址出土的碳化米粒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古人类刚刚开始栽培野生稻时，栽培的不是栽培稻而是野生稻。”^③ 人类行为介入野生稻的繁育后，人类的收获、播种等行为使野生稻的繁殖形式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以适应人类的栽培行为。^④ 一般而言，水稻经历了由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演化过程。起初人类利用野生稻，进而选用其中较优的品种进行人工栽培。因此，在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程中，稻谷粒型经

① 丁金龙：《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与稻作农业》，《嘉兴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第 22-23 页。

② 曹志洪：《中国史前灌溉稻田和古水稻土研究进展》，《土壤学报》2008 年第 5 期，第 786 页。

③ 汤陵华：《绰墩遗址稻作遗存鉴定与植硅体分析》，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编著：《昆山绰墩遗址》附录八，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9-333 页。

④ 汤陵华：《绰墩遗址的原始稻作遗存》，《东南文化》2003 年增刊 1，第 46-49 页。

历了从野生稻的粒型小、变异小，向粒型多样化、变异幅度大的过渡，再成为粒型大、变异小的栽培稻。漫长的演变过程，改变了野生稻的原始特性，使其向栽培稻进化。

那么，马家浜时期水田是如何开辟出来的，又是如何耕种的呢？有学者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现代民族学志材料等分析，认为史前时期水田稻作农业可能长期存在两种耕作方式，即踏耕和火耕水耨。

踏耕是以牛或人下田将泥踩烂，使其适合水稻生长的一种耕种方式。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若以考古学资料来分析，在史前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区动物踏田的农业是存在的，而早期稻作并不是人为有意驱使某一类动物下地踩踏出一块耕作土地。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始于直接利用野生麋鹿践踏过的沼泽泥地撒种子……早期水稻田在原生土面上。原生土，即考古地层上称为“生土”的层面，“生土”属于自然沉积，生土表面的土质一般是不松软的，直接使用工具耕作较难，只有经过动物踩踏成泥浆后，才可以种植。^① 在绰墩遗址发现不少麋鹿角，其中，编号 S16 的水田内还发现一件用麋鹿角做的工具。周边如草鞋山、常州圩墩、嘉兴马家浜、河姆渡等遗址均发现麋鹿角或以麋鹿角制作的工具，而且数量比较多。例如，河姆渡遗址鹿角达 1 400 余件，麋鹿角占三分之一。^② 由于麋鹿数量多，在成群麋鹿踩踏过的沼泽泥地，开辟出一片农田来种植水稻，再开挖水沟、蓄水坑等水利灌溉系统，基本可以保证水稻的生长。

“火耕水耨”是另一种耕种方式。有学者通过对绰墩遗址水田的表土层的孢粉和水稻植硅体的分析表明，在水稻植硅体浓度较高的史前稻田与现代稻田的孢粉学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

① 陈晶：《麋鹿的奉献——新石器时代的骨角工具》，《故宫文物月刊》第 309 期，第 1-12 页。

② 陈晶：《麋鹿的奉献——新石器时代的骨角工具》，《故宫文物月刊》第 309 期，第 2 页。

性：禾本科花粉（水稻）占主要优势，但其他水生植物花粉（香蒲等）含量则很少。这说明先民在水稻耕作过程中可能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清除杂草的劳作。^① 例如，水稻成熟时先用手或骨（石）镰收获稻穗，然后在田间用火将稻草和水生杂草的秸秆和种子一起焚烧，这就是所谓的“火耕”，以便使来年土壤肥沃，种植方便，同时还杀灭了水生杂草。春天直播或用骨耜点播稻种前，引水淹田，使土壤表层软化，再以脚踏或驱牛入田“踏耕”。其起源可能受自然界一些动物如象、麋鹿在沼泽泥地踩食植物后造成的烂糊现象的启发，江苏沿海一带在公元4世纪时还有农民利用麋鹿踩食过的烂糊地播种水稻的习惯。^② 在稻苗生长期间维持一定深度的淹水层，为水稻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可以抑制或杀灭旱生杂草，这就是所谓的“水耨”。^③ 现代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还保留刀耕火种的方法，只要烧掉矮树，清理出小块土地，在耙平的灰烬中播种即可。例如，宋代范成大在《石湖集》十六《劳畚耨（并序）》诗序中描写南方耕畚情形：“畚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④ 土壤是一种有机体，肥力最好的是它的表土层，这是因为田地上的枯枝落叶与根茬主要在表土层，是许多土壤微生物的食物来源，而深挖多耕会使土壤的性质变化，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肥力减退。为此，日本在20世纪

① 李春海、章钢亚、杨林章等：《绰墩遗址古水稻土孢粉学特征初步研究》，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编著：《昆山绰墩遗址》附录二，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② 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③ 曹志洪：《中国史前灌溉稻田和古水稻土研究进展》，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编著：《昆山绰墩遗址》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269页。

④ 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60年代研究提出了稻田免耕，20世纪70年代进行推广。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①从而证明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类所采用的耕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绰墩遗址马家浜水田土，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沉积与环境重点实验室碳-14年代测定：水田土壤的有机质距今6240年。据此可以认为，绰墩遗址种植水稻的人类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昆山人；水稻田是先民留下的最早的文化遗存。而且绰墩遗址发现的水田有与之相配套的灌溉体系，如水沟、水口、蓄水坑（水井）。蓄水坑的功能，既可积蓄天然水，又可开采利用地下水。太湖平原地下水位高，水资源丰富，地表下不到1米就会出现地下水。

而人类生活离不开水。在远离水源或缺水时，每当下雨，人类自然会想办法去接水，如利用盆、罐等工具接取雨水，或挖坑等来储存水，于是蓄水坑便成了最初的水井。在考古发掘中，坑与井有所区分，一般而言，圆形的坑，依据坑壁垂直或相对垂直及较深者，定名为“水井”；相反，斜壁较浅者，定名为“灰坑”。其实，史前人类在生活或生产过程中，对井与坑的区分并不是如此明确。为此，研究人员只能依据其所处位置及功能来确定是水井还是灰坑。在绰墩遗址居住区发现的蓄水坑，所蓄水大多为生活水源，而在遗址水田内发现的蓄水坑，其性质为灌溉水源，并通过水口、水沟进入水田。在绰墩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包括草鞋山遗址发现的水田）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田。为此，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水井先于黄河流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②由此

^① 王介章：《我国传统农业中的精耕与免耕》，《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第11页。

^② 钱耀鹏：《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第107页。

可以证明，昆山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与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不仅如此，在昆山姜里遗址还相继发现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时期的水田，在朱墓村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田。类似的发掘成果说明，昆山是中国发现史前系列水田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二、史前建筑与先民生活

水稻田的出现使社会经济从渔猎经济逐步向农耕经济转化，人类开始从动荡不定的渔猎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因而与此相关的人类居住建筑开始出现。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最早的原始文化，绰墩遗址一共发现马家浜时期居住址三座（编号 F7、F13、F15），其中，编号 F7 保存比较完整，其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 5.6 米、东西长 6.8 米，分居住和厨房两部分。^① 编号 F13 平面形状呈圆形，结构为浅地穴式，东西直径 2.85 米、南北直径 2.93 米、深 0.96 米，南面有一台阶，分两级阶梯下入室内。屋顶用芦苇、竹席或草束覆盖，屋内以内含稻谷壳的红烧土铺垫地面来防潮，屋外开水沟排水等，以适应南方水乡地区的环境。草鞋山遗址内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居住遗迹有柱洞、木桩和木板。木桩竖立在地面上，应该是房屋的柱子，其中，最高的一根约 1.5 米，有的木桩下面垫有一至两块木板。在木桩周围发现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捆扎的草束、芦苇、篾席等。^② 此时建筑已采用木结构，而且已经广泛采用榫卯结构技术。距今 7 000 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出现以架空基座为特征的干栏式建筑长屋。在

① 丁金龙：《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0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 年第 3 期，第 1-24 页。

出土的 1 000 多件木构件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形状的桩木，其次是木板和圆木，还发现一些带有榫卯的木构件，都是垂直相交的榫卯部件。榫头的种类有梁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柱头刀形榫、双叉榫和带销钉孔的榫等。^① 其中，两件榫头截面长宽比例为 4 : 1，符合受力要求，结构科学，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可见，当时的建筑水平已相当进步。

这一时期遗址内出土的遗物以牛鼻耳罐、瓮、盘（盆）、钵等器形为主，这些器具都与定居生活及农业经济有关。瓮、罐是盛水或装粮食用的；盘（盆）、钵等器具，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陶钵是盛米饭归个人使用；陶盘（盆）是装副食的“菜盆”，装盛公用的菜肴以佐主食。^② 另外，遗物内还发现有甑，这种甑与稻作农业关系密切。三国谯周的《古史考》中有“黄帝作釜甑”，又有“黄帝始蒸谷为饭”的记载，说明甑是用来蒸饭的。马家浜文化时期还出土较多陶釜与炉条。陶釜是炊器，外表都有烟炆痕，河姆渡出土的陶釜底部残片，有几块存有被烧焦的米粒残渣，其米粒痕清晰可辨。可见，陶釜是烧煮食物的炊器。炉条是把五六根圆柱形或圆角方形的陶条组合在一起，整器呈长方形，四角为圆角，两端中间朝上的一面各有一个把手，可以吊起悬挂在架子上。这种器形是专门用来烤肉类等食品的，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的最早用于专门烤食物的器具。绰墩遗址中同时出土大量动物遗骸，在编号 S16 水田内出土一件鹿角，研究人员鉴定其为麋鹿；在编号 H10 坑内不仅出土大量陶片，还发现大鹿角与鹿头骨及牙床等；在编号 H14 坑内出土腰沿釜、豆、盘（盆）、红衣陶罐，另有较多兽骨，常见有猪、龟等骨头，并出土骨针、陶球及禽骨、鱼骨，

① 陈万里主编：《潮起东南——河姆渡文化图录》，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7 页。

② 陈文华：《新石器时代饮食文化的萌芽》，《农业考古》1999 年第 1 期，第 215 页。

经火烤后呈蓝色；在编号 H128 坑内出土一具完整动物骨架，可以推测与当时人类饲养动物有关。这些鹿、猪等动物皆是先民们烤的主要“野味”。绰墩遗址的发掘资料生动展现了昆山先民们居住与生活的场景。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们以种植水稻为主，以渔猎与采集为辅。编号 H14 坑内出土的骨针、编号 M87 中出土的陶纺轮等，结合草鞋山遗址编号 T202 中发现的 3 块碳化的纺织物残片（经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鉴定，认为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藤，织物为纬线起花的螺纹织物），可以推测昆山先民们当时纺线（麻）缝制兽皮作为“衣裤”来遮体与御寒。绰墩遗址还出土马家浜时期墓葬（编号 M73），人骨经鉴定为壮年女性，其头部脑后发现一件象牙梳，象牙梳应该是插在头发内的，说明当时的女性开始束发。当然，可能女性那时还不太重视装饰美观，主要是为了便于行动，如收割稻子、采集、炊煮、制陶等。

马家浜文化开始出现公共墓地，说明村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出现了管理者。当时盛行俯身葬及头向北的埋葬习俗。绰墩遗址中还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的 3 座居住址（编号 F4、F8、F14），有 34 座墓葬集中在一处，墓地中心排列着成人墓，周围为儿童墓。成人墓头向以南为主，均有随葬品，儿童墓头向不一，大多没有随葬品。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南。虽然崧泽文化承袭马家浜文化而来，但在埋葬方式上明显区别于马家浜文化时期俯身葬及头向北的习俗。

绰墩遗址发展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由村落发展为聚落，活动范围扩大，其文化堆积在整个遗址中心区都有分布。考古发现居住址 9 座（编号 F1、F2、F3、F5、F6、F9、F10、F11、F12），住址形状有长方形、圆形；建筑结构有平地起筑式、半地穴式、干栏式。其中，编号 F11 是浅穴式建筑，其墙体是建筑堆积层堆筑完成后，室内部分下挖而形成浅地穴式结构，四周高出部分为墙。墙高等于浅地穴的深度，即 0.1~0.2 米，然后在墙内立柱直至生土。在建筑堆积层上先下挖形成居住

面，再铺垫木板、芦苇编织物等。芦苇编织物是用2根1厘米或1根2厘米长的芦苇压扁后（约有9片）交叉编织成席，其经纬各宽5.5~6厘米。这种编织物用于室内铺垫，也为屋顶建筑材料。从编号F11的发掘情况来看，其堆积可分为三层，最下面一层为建筑堆积层，纯黄土，无包含物，厚20~40厘米。中间一层为使用堆积层，是当时人类活动留下的生活堆积，厚5~10厘米。其中，在东北部发现有芦苇编织物，在芦苇编织物上发现有陶豆、陶鼎残片，在芦苇编织物下发现有木板、木炭等，此处估计为睡觉的地方。在室内西北部发现一块大砺石，西南进门处有一堆陶片，器形有鼎、豆、罐、黑皮陶宽把杯、漆木杯等，此处可能为餐饮的地方。另外，在室内西部还发现有竹篾编织物，其内发现稻谷，由此推测此处应是存放粮食的地方。而最上面的一层为废弃堆积层，厚10~20厘米。考古发现有大量编织物，覆盖在北排柱洞上及室内，据研究推测，该编织物估计为倒塌的屋顶。^① 值得一提的是，室内发现的芦苇编织物，表面平整光滑，类似现在的芦席。在芦苇编织物上发现当时人生活用的泥质黑皮陶宽把杯、漆木杯，其中泥质黑皮陶宽把杯（编号F11②：5），鸭嘴形流，筒形腹，矮圈足，外表油黑发亮，通体饰鸟纹，菱形网格状内刻满鸟形图案，几十只鸟大小各异，线条细若发丝，但又异常清晰流畅，鸭嘴形流下及圈足上饰有稻穗状纹。肩至下腹附有一个宽把，上有40多根泥条贴面。这是目前苏州出土的最为精美的良渚陶器之一。另一件漆木杯（编号F11②：7）器表涂有漆，外红内黑，形似碗，圆弧腹，附有一个把手，圈足底，环绕腹部有一周圆圈纹。漆木杯外面为朱红漆，是目前在苏南一带发现的最为精美的良渚漆器之一。从其房屋的结构、内部空间的分配、外部的环境、出土的遗物等方面来看，房屋的主人不会

^①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昆山市正仪镇政府：《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第一至五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第19页。

是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的普通平民，应该是社会的贵族阶层。^①

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充分利用苏南特有的竹子、芦苇等自然物为建筑材料。不仅绰墩遗址（编号 F6）被发现在土墙基槽内置木棍、芦苇等，用作墙骨来增强墙体牢固度，另外，少卿山遗址（编号 F1）也发现有类似的墙体结构。其用 2 根芦苇并排为经线，5 根芦苇并排为纬线，经纬交叉编织为墙骨，其中，经线一上一下错开，同层经线间隔 2~3.5 厘米，纬线间隔 30 厘米，共有三排，经线竖插入土内 20~30 厘米，并每隔一定间距竖立木柱，以固定芦苇编织的墙体，在墙体内外抹上 5~6 厘米厚的含稻草、苍糠的泥土，即“木骨泥墙”。抹泥不仅可以起到加固作用，还可以御寒和防火。^② 在绰墩遗址的居住址（编号 F2）内还发现埋有整只动物的编号 H5 的坑，可以推测这与建造房子时奠基有关。

这一时期的人类不仅利用自然环境，而且开始为生存改造环境。在聚落四周开挖环壕，并开挖一条 6~9 米宽、东西向的河道与环壕连接；住址建造在河道的两岸，为防止发大水时冲毁堤岸，堤岸先用红烧土块堆筑，或用黄土堆筑，然后打满密密麻麻的木桩进行加固。两岸居民往来有渡船作为工具。在河道内发现一个长 1.1 米、宽 0.7 米、厚 0.23 米左右的大木块，经南京林业大学鉴定，其材质为二针松，体积 0.177 1 立方米，干重 94.4 千克，浮水力 82.7 千克（极限）。在当时，大木块被视作渡河的工具。大木块一端为垂直面，另一端为 38 度的斜面，其斜面类似船头而便于靠岸。在大木块中心有一个象鼻孔把手，把手的作用据推测为：在象鼻孔内拴上绳，

① 林留根：《绰墩遗址良渚文化聚落与晚期良渚文化遗存》，《东南文化》2003 年增刊 1，第 69 页。

②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化局、千灯镇人民政府：《江苏昆山市少卿山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 年第 4 期，第 96-97 页。丁金龙：《苏州地区新石器时代居住址及相关问题之探析》，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8 页。